

宏文校

与

王维舟

历史档案



王维舟创建的宏文校工字楼

在宣汉县清溪镇临近江口湖畔的宏文校园里，一座修葺一新的“工”字形校舍格外引人注目，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们走进了孕育巴山烽火的摇篮——一座被赤色浸润的红色校园。

宏文校已有近百年历史，百年来，宏文校虽地处巴山从林之中，但绝非世外桃源。上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下至新中国成立，世纪的风雨无不在此留下深深印痕。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清溪开明人士就以寺庙为校舍创办“兴文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溪贤达王佐卿、符培心力倡改革，商同地方人士筹集办学经费，以清溪禹王宫为校舍创办“宏文高等小学堂”，实施教学改制、教育倡新，学堂开始分班授课，力行“尚今、尚武、尚实”的办学宗旨，师生教学相长，眼界大开，风气大变，唤起了学校师生及民众的觉醒。从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到辛亥革命光复东乡，乃至“护国”、“护法”，宏文校师生或走向街头唤醒民众，或投笔从戎奔赴战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强烈的震动、巨大的影响，“宏文”树起了自己最初的进步形象。

然而，宏文校彪炳史册的辉煌时期，却是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维舟接办“宏文”后的二十年代初期开始的。

1923年春，被父老乡亲誉为“清溪第一人”的王维舟回到故乡清溪场，为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唤醒大巴山民众，创办了宣汉县最早的新校之一——新群女子高等学校。他聘请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尹素筠、洪登月和覃光明等为教师，还亲自创作了《新群女校校歌》、《女子解放歌》等通俗易懂、富有战斗激情的歌曲。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困苦，宏文校衰败不堪，学生愈来愈少。王维舟决定将新群女校与宏文校合并，振兴宏文校。毁家疏财，带头募捐，发动族人和乡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过一年的努力，一幢仿苏俄建筑的“工”字形教学楼在乡亲们的期待和惊喜中竣工了。这幢“工”字形教学楼寓含着宏文校“面向工农、兴学育才”的办学宗旨。教学楼的每块砖都刻有“宏文校”三个字，铭记着宏文校培育革命人才的历史重任。

1925年初，王维舟正式接任宏文校校长。选聘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宋更新、冉雨生等为教师，建立新型的师资队伍，并联系社会青年雷玉书、冉南轩、冉海舫、周伯仕等十多人建立川东北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校内外积极传播马列主义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开展革命活动。同时开设新学课程，废除尊孔读经，倡导教师自编自选教材，讲授科学知识、传播新文化，灌输革命思想。开辟图书阅览室，陈放《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让师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了解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概况。

“五卅”惨案发生后，宏文校组织了后援委员会，师生上街游行，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募捐150个银元，汇上海总援会，援助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还充分利用节假日，组织师生自编自演新剧（时称文明戏），揭露黑暗政治，动员人民起来斗争。同时深入农村开办农民夜校，建立农民协会组织。

1925年寒假前夕，王维舟等人在宏文校的地下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察觉，反动当局极为震怒，大势搜捕革命党人，宏文校更是被敌人视为“匪区巢穴”而遭到反复“清剿”。王维舟、周伯仕等被迫离开宏文校，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充分发动群众同反对派周旋斗争，打击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同时决定利用地方武装组建地方游击队，用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928年10月，以宏文校师生和各贫民夜校学员为骨干力量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同敌人开展英勇斗争。蓬勃发展的武装革命斗争使敌人惊恐万分，反动当局对革命党人血腥屠杀，川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几起几伏，宏文校也随之盛衰沉浮。

然而，部分宏文师生和农协会员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杀奸除恶，打击顽敌。1933年10月，川东游击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宣汉全境解放，同年11月，以川东游击队为骨干力量的红三十三军在宣汉县城西操场宣告成立，军长王维舟和三位师长蒋群麟、冉南轩、王波都先后在宏文任教。

随后，在保卫苏区，扩大红军的热潮中，宏文校师生组成的文艺演出队活跃在校内外，进行文艺宣传，歌颂苏维埃政权，歌颂红军，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红军队伍，在校内外掀起了参加红军的高潮。宏文校教师黄中夏、桂会清、严仕金，学生王心学、王心全、王心兰（9岁）、王心六、李长碧、符泽筠、黄光金、符代泗、符必全、李长燕、符泽宇等300余名师生相继请缨从军。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唤醒了沉睡的国人，也唤醒了宏文师生。宏文师生在宣汉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后河岸边，四望山下，清溪街头，到处都留下了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发动群众为陕北公学募捐，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举办抗日书会、壁报，介绍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组织街头演讲队，揭露日寇的罪行，唤醒民众的觉醒。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不少优秀的宏文青年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奔向了抗日前线。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喜讯传来，宏文师生立即涌上街头，举行集会和游行，载歌载舞欢庆八年浴血抗战的伟大胜利。

正当宏文师生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全面内战，刚从日寇铁蹄下喘息过来的中国人民，又陷入苦难深渊。宏文师生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高举“争和平、反内战；争自由，反独裁”的战斗旗帜，秘密联络进步青年，建立起“青年学友会”、“普金社”、“民主青年先锋队”等各种进步社团组织，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同时，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抗粮抗捐、抗租抗税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秘密购买武器，开展武装斗争，配合全国解放战争。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分，坐卧不安，他们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对革命者进行疯狂镇压。面对敌人的屠戮，宏文校师生不屈不挠，掩埋好校友的尸体，擦干脸上的泪水，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终于迎来了大巴山的黎明。

□ 龚建华

# 抗日战争时期达州银行业繁荣

民国时期达州的银行业以抗日战争时期为甚。达县城内金融机构林立，出现了战时的繁荣景象，是民国达州金融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 国家银行

民国时期达州没有中央银行机构，国家银行只有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达州机构较多，开办时间较长。1939年，中国农民银行在宣汉、渠县设办事处；1941年5月，在达县今翠屏路设达县分理处，属宣汉办事处管辖；1943年升格为办事处，同时还设有罗江口农业仓库，办理农产品押贷业务；1945年宣汉分理处撤销合并于达县办事处。而1943年春成立的交通银行渠县分理处，于当年9月业务清淡裁撤。1945年5月中国银行成立渠县分理处，6月成立达县办事处，因抗战胜利，紧缩川内机构被裁撤。这些银行除了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外，重点发放农贷，推动合作事业，代理中央银行收缴各行、庄存款准备金等。

## 商业银行

达州最早的商业银行当数1934年，重庆聚兴诚银行在大竹、宣汉设立的隆和、丰义代理处，主营汇兑业务，1946年撤销。此后，总部在重庆的四川商业银行、四川农工银行（原名为江津农工银行）、美丰银行、重庆商业银行、永利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同

心银行等均在达城设办事处。安康银行、美丰银行、巴川银行在三汇设办事处。由范绍增任董事长，范众渠任总经理，总行设在重庆的复华银行，1944年3月，经财政部批准在三汇也设有办事处。这些商业银行发放商贸贷款，支持政府及商号收购苎麻、桐油、猪鬃等土特产品供军需及出口美国和东南亚。一些银行独资或合资创办商号从事商贸，甚至银商勾结抢购物资。开展票据买卖，炒买炒卖申票、渝票、合票等商业票据。

## 地方银行

1934年，四川地方银行总行设重庆陕西街，在达县城翠屏路设立代办所，次年改为绥定办事处，1936年2月更名为四川省银行达县办事处；1938年10月，在三汇镇设立渠县办事处，次年10月迁入县城十字街；1939年8月设大竹办事处；1940年3月在宣汉坎街设宣汉办事处；1944年11月，在开江县城东街设立开江办事处；1942年1月四川省银行达县办事处升为支行；1946年7月达县支行升为四等分行。四川省银行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还发行兑换券（简称地钞），代理省级财政金库。1946年9月，四川省银行将总行搬到成都。

1934年宣汉县府曾倡导设立农民（农村）银行未果。1935年3月，大竹筹设农民银行，因名称与中国农民银行相同改称农村银行，后因资金不足，先成立农民借贷所18个。同年10月17日，渠县政府决

定官商集资，筹办农村银行，额定资本10万元。大竹延至民国25年8月成立筹备处。渠县延至民国26年5月15日成立农村银行筹备处，但均因资本不足、人才缺乏未正式成立。

1940年财政部颁布《县银行章程准则》后，为调剂地方金融、扶助经济建设，发展合作事业，1941年至1946年开江县银行、渠县银行、大竹县银行、宣汉县银行、万源县银行陆续成立。其中1943年1月经地方官署登记转请财政部核准注册，达县设立县银行。原注册资本50万元，后因资金不敷周转，以募各乡美金公债和招募股金逐步扩充股本。到1946年6月，资本总额增至58万元。1948年初法币急剧贬值，无法继续营业，呈准达县县政府提高公股比例，年底增加资本到1万元（金元券），公股股各占一半。县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设董监事会，公股董、监事由县政府派充，私股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任期三年，监事任期一年，连选连任。董事会推选董事长1人，常务董事若干人，并任命经理1人主持日常工作。这些县银行主营县内农业及工商业的存款、放款、汇兑业务，并代理县级及县以下财政金库。

1949年12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达县时，对仅存的中国农民银行达县办事处、四川省银行达县分行、达县银行3家金融机构进行了查封。

□ 肖光庆

## 达州金融旧事

桥湾自汉代建场后，多次改名，先叫万州，次叫万荣郡，南朝梁时称永康县，隋朝改为永穆县，宋朝改名永睦县。命名“永睦”，是因其镇北郊有名寺永睦寺之故。此寺初建于南北朝，扩建于宋朝。据碑记：寺初有三重殿，宋修扩成十二重大殿；南北长60丈，东西宽18丈；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白墙黄瓦；前大门口有一对高八尺的鲜活雄壮大石狮；内有“三界”菩萨千余尊。八大王入川时，火烧了前九大殿，仅余后三殿。后大殿的关圣大佛，高达三丈，可称达州大佛之冠。寺内壁彩画数百幅，皆出于大师杨精匠之手，杨曾被聘为四川大学客座教授，是民间专家，听说在耄耋之年还受过周恩来总理接见。

寺内有两口铁铸大宏钟，重达千斤，一雌一雄，雄钟原悬于云顶寺，雌钟原悬于香炉寺，传说每逢旧历初一夜，雄钟飞赴香炉寺，十五夜雌钟飞赴云顶寺，两钟如分居的恩爱夫妻。有一年除夕，两钟不期而飞往永睦寺给三界菩萨拜年，由于深夜漆黑，两钟猛撞，双双坠入桥湾“影桥”之上，后经数百人连拖带抬，才运入永睦寺。只见两钟的翅膀（即钟耳朵）都已撞掉，从此再也飞不起来了。上世纪五八年“大炼钢铁”，将两钟砸碎，冒充是铁山上的“土高炉”炼出的新铁，向上级报功。永睦寺在解放初被作为仓库，土改时，又将其分给僧人和贫下中农。“文革”时，红卫兵“破四旧”将所有菩萨、壁画尽毁，惜哉！

桥湾南岸的走马梁，马头接香炉寺，马尾接云顶寺；马脖子下有一大石洞，洞壁上刻有一匹大赤马；相传此马是走马梁的“缩影”，夜间月下他就“复活”而上山梁吃青草，洞内有一古山（即古坟），藏有三国时的宝物。亦说此马乃关羽长的“赤兔马”，在其败走麦城后，隐藏于此。

香炉寺四周有千年古柏，虬枝苍劲，排列有序，高达数丈。远看形如唐僧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去西天取经。可惜此古柏在“大炼钢铁”时，全被砍去烧炭炼铁毁了。香炉寺又叫香炉寺，其驴为雄驴，走马梁之马为雄马，他俩雌雄交配，生下一骡子。骡子不能育后，便修炼成精，藏于“大雪滩”下的“骡子洞”。当初鲁班与徒弟赵巧打修“桥”和“仓”，限一夜建成，鸡叫完工，后赵巧要赖，三更就学鸡叫，遂使两工程半途而废。后来鲁班大师心发慈悲，又补修了“万年仓”，并在“影桥”南头，修了桥头堡，人称“桥堡湾”；还在百丈深水下修了“龙门”，有对大鲤鱼，经过数百年修炼，终于跳过这“龙门”，成了鲤鱼精——据说这便是“鲤鱼跳龙门”的来历。此鲤鱼精与骡子洞的骡子精结为仙友，晚夕相会，常在洞中高谈阔论，预测人间凶吉，畅述世间奇闻，其流传颇多。

香炉寺右侧，有座大石寨，寨前两尊大石，形如一人一鼓，远看像猴子在打鼓，巧妙绝伦，故名“打鼓寨”。离打鼓寨不远，有座修建得十分精湛的“肖公庙”。庙内塑有地府十大殿，龙王和阎王爷坐镇各殿。地府的地狱，有奈何桥、望乡台、虎口关、吴二爷等，皆塑得活灵活现。凡在阳世为非作歹，欺压良民的恶人，死后便被打入这十八层地狱，受到恶魔小鬼的磨子推，锯子改，油锅炸等刑法。所有的鬼怪恶魔，皆塑成青面獠牙，栩栩如生。可惜在“文革”时，这肖公庙全被捣毁。

以上乃桥湾景观损毁之代表，若能修复如故，当可为达州的旅游佳处。

□ 吕大志

## 达州地理

### （上接第一版）

赵小军向记者展示了一条简单的干部能力建设培训链条：第一步，根据干部能力模型测试干部能力、素质，找出能力缺失、差距等情况；第二步，按照干部所需，从个性素质、核心能力、专业技能等方面为干部量身打造近、中、远期培训计划；第三步，在实践中提升能力，主要通过上派、下派、外派挂职锻炼等方式；第四步，考察、识别任用干部，通过跟踪考察在重大事件、重大任务、重点工作中的干部，采用公推、直选等方式将能力素质提升较快、实践能力较强的干部选送到重要岗位任职。

而培训工作则是最基础的一步。据介绍，培训的主要方式是大讲堂，在县委党校设立主讲堂，由高等院校教授集中讲课；各乡镇设立分讲堂，采用同步视频的方式，让乡镇干部集中学习，王红梅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了全部课程。截至目前，每期培训300人的“大讲堂”已经开班13期，第14期正在报名。

5月10日，宣汉第一批公选干部选出，72名后备干部激情参与，4名优秀人才连过数关，分别担任花池、红峰、凤林、漆碑4个乡镇党政正职领导干部。

### 干部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

赵江南坦言，经过培训后，基层领导干部主要是从思想意识上获得了提升。在发展镇域经济的时候，提出的发展思路有了载体，便于操作。

才到五宝镇任职5个月，摸清了当地情况的赵江南已经在规划着整个镇的发展：河对岸平坝容易遭受洪水袭击，预计种植投入不大、生长期较短的作物，而山后一大片平坝地段打算成立一个蔬菜基地，而“五宝—天台—南坝沿线”预计将成为奶牛饲养基地……“作为乡镇一把手，我现在主要是发挥各分管领导和村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大家共同研讨，提出对镇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可行方案，这些方案不仅仅是分管领导提出的，而是在交叉，集合了全体干部的智慧。”

2008年2月，向川通过全县公开选拔考试，成为了宣汉县双河镇副镇长。“通过干部能力建设，关键是促进了知识的更新，让我具备了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了解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作为乡镇副职，以前只需要执行能力，现在则强调主观能动，执行只是其中必须的一个步骤而已。”向川在自己分管的农业领域干得心应手充满激情，目前，双河镇方斗村的农业产业园已经成为整个宣汉县的一个亮点。“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方斗村农业产业园区，而是整个镇的产业经济，目前已经提出了双河镇域经济发展的思路，现在开始着手执行。”

宣汉县旅游局的张朝阳被下派到七里乡任乡长助理，“干部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在工作的创新上。”张朝阳告诉记者，乡镇干部面对的都是传统的、一贯的农业生产模式，要发展区域经济，就必须因地制宜提出新的思路和操作模式。达万高速将在七里乡马蹄村开设一个互通式出口，“七

里乡有了强力发展的契机。”张朝阳显得兴奋，“充分依托互通式出口这个交通优势，大力发展蔬菜、养殖等产业，扩大场镇规模，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但更多的时候，张朝阳则“驻守”在田间地头，和农技员、农民一起试验着“蔬菜、西瓜、黄瓜、晚稻”三季生产或在“油菜行间种植秋洋芋”等。“要发展乡镇经济，产业化的确是一条途径，但光靠扶持大户、业主还不够，通过调查，我发现当地农民缺乏的不是积极性而是资金，我们以前也通过信用社给部分大户、业主带过款，但这样只能发展个别，如何让所有人都发展才是农村工作的重点。”他告诉记者，为了要“发展所有人”，他最近正在研究大竹县高穴镇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公司+基地+农户’还不够，要解决资金瓶颈，还得‘公司+基地+农户+信用’才行，我打算马上和人民银行以及村镇银行或农村信用社进行沟通，在七里乡进行信用体系建设试点。”虽然，到今年10月份张朝阳就下派期满，但他“得把工作做下去，至少有个良好开头，以后其他人也好顺利接手。”

“干部能力建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基层干部在发展区域经济中胜任角色，不仅仅做一个县委书记发展思路的执行者。每个地方都良性发展后，又会在竞争中继续发展，镇域经济发展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就会顺理成章。”陈泽建说宣汉县委政府充满了信心，“农村才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一个地方发展了农村经济，这个地方就会站在县域经济的制高点上。”